

第 1 章

人文學科與通識教育*

古典人文學科的基本涵義

人文學科是甚麼？根據牛津英語詞典，人文學科是指有關人類文化的學問或文學研究；此一術語包含不同類別的優雅學問，例如文法學、修辭學、詩學等尤其是希臘及拉丁語言的研究。顯然，這個定義一方面太寬鬆，另一方面又太狹窄，對我們的討論可謂幫助不大。事實上，社會學和人類學所關注的亦是人類文化的問題，但我們很難將這兩門學科歸入人文學科的範疇內。如果人文學科所指的只是希臘及拉丁語言的研究，那麼許多被視為人文學科的科目都會被排除於這個領域之外。

美國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有關人文學科的定義能為我們提供一個較為清晰的概念：

人文學科尤指一思想方法、學術範疇。人文學科之科目從經典著作研究到分析當代問題不等；研究方法包括個別的學科研究及綜合科際研究兩方面。人文學科包括(但不限於)：歷史、哲

* 原文載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9卷1期(2000年3月)，頁5-13。

學、語言、語言學、文學、考古學、法學、文藝批評與歷史、倫理、比較宗教，以及以歷史和哲學方法為研究進路之社會科學；而最後一類則包括政治理論、國際關係及其他關注問題之「質」及價值多於關注其研究方法之科目。¹

事實上，將以上學科羅列出來，並未能引領我們深入了解人文學科之真確意義。然而，透過人文學科之對立面——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卻能為人文學科之意義提供一個指標。人文學科是以歷史和哲學方法為研究進路，所關心的是有關人類生活與文化之「質」與價值的問題；至於客觀與「量」之問題則屬於自然科學的研究範疇。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科目，前者是主觀和思辨的，後者則是客觀和實在的。英國作家斯諾 (C. P. Snow) 在很久以前已經指出將這兩種文化截然劃分所產生的危機。²

如果我們回溯「人文學科」(*humanities*) 之字源，會發現根本沒有任何反科學的意思。文藝復興時期，所謂「人文學習與課程」(*studia humanitatis*) 除了指文學、藝術及哲學外，還包括自然科學的研究。因此，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兩極對立可說是現代世界產生的現象。³

西方人文學科的意義是植根於古代傳統的，後來則發展成人的理念與教育的理念。「人文學科」(*humanities*) 一詞源自拉丁文

1 “About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https://www.neh.gov/about>.

2 Charles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3 Robert E. Proctor, *Education's Great Amnesia: Reconsidering the Humanities from Petrarch to Freud with a Curriculum for Today's Stud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

humanitas。公元二世紀，羅馬哲人烏斯格利 (*Aulus Gellius*) 為人文學科提供一明確的定義：

說拉丁語的人及正確使用拉丁語的人都沒有賦予人文學科一般人所認為應該具有的意義，例如他們沒有將希臘人稱之為 *philanthropia* 的概念賦予人文學科一詞 (*philanthropia* 指一種友愛精神，涵有以持平友善的態度對待他人的意思)。但是，他們卻賦予「人文學科」一詞希臘「派地亞」(*paedeia*) 之概念，其意為 *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即「美優之藝的教育與訓練」的意思。熱切渴望追求美優之藝的人可謂最具人性 (*maximihumanissimi*)。在所有動物之中，只有人類會追求美優之藝的知識與訓練，因此，美優之藝被稱為 *humanitas*，即人文學科 (*humanities*)。⁴

在本文的討論中，人文學科的意義由兩個相關概念決定。這兩個概念對了解人文學科可謂最重要。其一為人的價值理念，人與其他生物不同之處在於只有人有成就最高德性之可能，即所謂「*humanitas*」。其二為課程的概念 (*curriculum*)，能引導人成就這種德性的美優之藝 (*bonas artes*)。因此，人文學科包含兩個概念：一是人之理想；二是人文教育之課程。然而，有關人的理想與這些課程的具體內容卻未清楚言明。教育是以培育人之德性為目的，使之成為一完全的人。在古典時期，有兩類典範代表這種完全的人 (或最具人性的人)，即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所言的哲學家與西塞羅 (*Marcus Tullius Cicero*) 所言的演說家。無論如何，哲學家與演說家並不是兩個完全對立的概念。事實上，兩者都是源自「派地亞」的概念，即希

4 R. S. Crane, *The Idea of the Human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3.

臘人的教育理念——成為一個自由人及好公民，兩者之區別只在於何者是優先取決的人生目標：為知識而追求知識的自由人？還是克盡公民責任的好公民？兩者何為衡量美好人生的終極標準？

所謂自由，一方面指人能從無知、獨斷、狹隘、傲慢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則指透過哲學反省，有追求智性及反思人生之自由，以獲得人生最大的幸福。⁵對於亞里士多德來說，追求知識乃人類最基本、最深層的自然性向。這個論斷與他有關人類的著名定義——「人是能言善辯的動物」(*zoon logon echon*)可謂息息相關。人的終極目的是透過形而上的知識實踐其潛在的理性。正如他在《尼各馬科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中所言，這就是幸福。直到今天，知識的自足價值與哲學家的模範依然是衡量人文學科之意義的兩個最重要準則。

此外，西塞羅與昆體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都認為，除非知識有助於人成為演說家，否則它沒有任何自足價值可言。在西塞羅時期，演說家的地位可謂出奇地高。演說家不僅是口才了得、能言善辯的演說者，更是社會的領袖。在公開場合，正確使用語言是演說家最重要的政治利器。西塞羅在《論演說術》一書中說：「我認為不磨練對成為自由公民有幫助之『藝』的人，不應歸入演說家的行列」。這裡強調人文學科一博雅之藝(*artes liberales*)的實際作用為演說家的基本要求。作為好公民及政治領袖，演說家不僅應具有理論知識，還應具有美德。昆體良說：「我們所培育的完美演說家必須是好人，因此我們除了特別要求他有演說才能之外，還應具有美

5 Martha C. Nussbaum,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the Human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Society," in *Applying the Humanities*, ed. Daniel Callahan, Arthur L. Caplan and Bruce Jenning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 3–28; Bruce A. Kimball, *Orators and Philosophers: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6).

德」。⁶這種人文學科之德性，依然是聲稱接受過人文教育的知識分子的基本原則。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服務社會。

文藝復興時期，「*studia humanitatis*」的概念即承繼這個傳統。十五世紀一位人文學者列奧納多·布魯諾 (Leonardo Bruni) 指出，人文學科的意義乃是古代遺產的反響。在一封寄給朋友的信中，布魯諾勸勉他的朋友多花點時間學習人文學科。在信中，他說：「你所學習的應包括兩方面：第一是有關語言與文學的修養 (*litterarum peritia*)。但這並不是一般隨意的學習，而是要更認真更深入地研究。我很希望你具有這方面的專長。第二是有關人生與德性的知識。由於兩者都是尊重人，使人成為完美的人，因此稱為人文學科」。⁷以上有關人文學科古典概念的簡略描述，足以幫助我們理解人文學科之意義，人的理想與導向實踐這種理想的課程。

假如我們追溯中國傳統人文學科的意義，會發覺它與西方的概念有顯著的相似性。在中國傳統中，「人文」這個字眼首次出現在《易經》一書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裡並不是指一般的人文活動，而是指一特定的道德活動。新儒家唐君毅先生解釋：「(中國傳統)於人文二字中，重『人』過於重其所表現於外的禮樂之儀『文』，而要人先自覺人之所以成為人之內心之德，使人自身先堪為禮樂之儀文所依之質地」。⁸這點與儒家教化的概念相照應，目的就是修己治人。

6 Kimball, *Orators and Philosophers*, 12.

7 摘自 Robert E. Proctor, 轉引自 Kimball, *Orators and Philosophers*。布魯諾時代的人文學科乃源自中世紀「七藝」(*septem artes liberales*) 教育，七藝中三科是有關語言的：文法、修辭及邏輯，其餘四科是「科學」學科：算術、幾何、音樂與天文學，參看 Kimball, *Orators and Philosophers*。

8 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台北：學生書局，1974)，頁25。

克萊恩：作為人文之藝的人文學科

克萊恩 (R. S. Crane) 《人文學科之理念》(*The Idea of the Humanities*) 一書可說是當代同類著作之經典。他在書中深入分析人文學科的概念從羅馬時代的西塞羅開始，經歷文藝復興時期至近代的轉變經過，並且指出，雖然人文學科一直都是以人的理念為核心，但其理念的意義與課程的內容則不斷地改變。最後，他對人文學科的理念作一明確說明：「有一觀點認為，單靠學習某門科目或追求某一抽象目標，都不足以確定人文學科的意義。要確定其意義，必須以某種方法正確地培育某種『藝』或某門學科的修養。這使此種『藝』或方法上的人文精神統攝於其獨有能力之下，以處理能使人完全與動物區別開來的人類體驗。其目的就是使人之為人能盡量體現潛能」。⁹ 現代的知識分門分類，克萊恩所持的觀點與此剛好相反，他並不認為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知識體系。他認為所有研究人類成就（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制度或藝術）之方法進路與精神方向，都具有人文學科的基本性質。例如，某人是某門「藝」之學科的老師，假如他以非人文方法為其研究進路，他就不能聲稱自己具有人文精神。事實上，問題並不在於教授甚麼，而在於如何教授。¹⁰ 根據克萊恩所言，「人文學術之方法或人文之藝有四組原則：(1) 語言之藝；(2) 理性概念之藝；(3) 文藝批評之藝；(4) 歷史知識與理解之藝」。¹¹ 他指出，「這四種『藝』就是人文學科之藝。由於在不同程度上所指的都是人文學術一般要探討的課題，這四種『藝』都超越了所有學科分際之界限。正因它們是各種不同類別的科目的總體結合，使得此一學科完全具有人文精神；正如在任何科學

9 Crane, *The Idea of the Humanities*, 7.

10 同上註，頁5。

11 同上註，頁9。

的範疇內，我們所獲得的科學知識與我們所學習到的成正比地達到極點。不僅是部分，而是要依靠所有不同類別的技能，才能構成我們籠統稱為的科學方法」。¹²

在這方面，克萊恩重申西塞羅有關做人意義的論斷，「只有在人文學科方面有過適當磨練的人才能稱為真正的人」。¹³ 克萊恩指出，各種不同知識的學科之間沒有形而上之分別界限。物理學與文學所研究的課題固然不同，但如果我們透過人文之藝來研究物理學，便會發現物理學的人文精神並不下於文學。理由是，兩者都是人文精神之重大成就。克萊恩的觀點與一般人完全不同。一般認為人文學科的威脅來自科學，但克萊恩卻認為此種威脅來自教條主義（或稱獨斷論）宗派主義及還原主義。教條主義對人類成就的多樣化感到盲目，令人墜入無知的深淵中。還原主義則否定人文主義的本質，將所有精神價值都還原為最基本的分子。例如，無意識、階級鬥爭、經濟力量等。¹⁴ 最後，克萊恩的結論是，「每當我們以探索及解釋的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具有以下特質的課題時，我們即在研習人文學科。(1) 能反映任何優越性之可能的東西；(2) 超越當下自然與大眾心靈所需的東西；(3) 各種人類活動所固有的東西」。¹⁵ 無論如何，克萊恩以上的論斷並未能引領我們深入了解今天人文學科的問題。他只是將人文學科於方法上的取向與其內容區分開來。對克萊恩來說，科目本身沒有問題。他強調人文之藝，如語言、理性、文藝批評和歷史理解等，都是發展人類智性的必須條件。事實上，這些藝本身即為人類的成就，並且是傳統意義上的人文科學的科

12 同上註，頁10。

13 Proctor, *Education's Great Amnesia*, 19.

14 Nussbaum,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the Human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Society," 14.

15 同上註，頁15。

目：語言學、哲學、文學、藝術和歷史。筆者贊同克萊恩強調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但認為我們不能把人文學科的內容相對起來視為任何東西，人文學科與其他科學之間確有一分界線。

普羅克特：回歸古典傳統的人文學科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學術氣氛與克萊恩時代不可同日而語。大學學位激增，加上科技與商業發達，對大學教育（尤其是人文學科）造成極大的挑戰。美國的阿倫·布盧姆不單將人文學科的衰落歸因於外在因素，例如大學水平下降、極端平等主義、反精英主義和科技發達等，還將人文學科的危機歸咎於人文學術道德上的腐敗以及人文學科教授的無能。¹⁶他分析道，「人文學科的教授的反應是令人失望的。他們覺得自己無關重要……人文學科陷入嚴重的危機中。首先，沒有人能確定人文學科是甚麼。這一領域變得莫名其妙……大學人文學科的部門只是一堆缺乏遠見的部門，人文學科的教授沒有解釋他們所追求的是甚麼知識，也沒有解釋他們對全人教育有甚麼貢獻。他們充其量只能帶點虛假自大的口吻聲稱自己代表文化」。¹⁷以上苛刻的批評，或許有點誇張，但筆者認為他所批評的大學教育與香港的具體情形非常相像。面對人文學科的危機，普羅克特 (Robert E. Proctor) 的《教育之失憶》(*Education's Great Amnesia: Reconsidering the Humanities from Petrarch to Freud with a Curriculum for Today's Students*) 一書可說是這方面最具批判性和建設性的著作。他甚

16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17 Allan Bloom, "University Standards and the Decline of Humane Learning," in *The Western University on Trial*, ed. John W. Chap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62.

至宣佈人文學科已死。他對人文學科的理念抱著非常保守的態度。對他而言，人文學科是有關古希臘傳統、羅馬哲學以及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學科。普羅克特所尊崇的英雄是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和彼特拉克(Petrarch)等人。他認為人文學科的意義在於成就人的智慧與德性。人文學科已死的意思，如他的書名一樣，是指學術界把這個大傳統完全忘記了。他認為對這種失憶的補救方法就是回歸傳統，他說：「這是因為我們被當前時代所摧殘壓制，對過去一無所知。我們只能思索、談論有關當下的經驗。就博雅之藝的課程而言，我們當下的經驗簡直是知識真空。而唯一能令我們從當下的壓制中解放出來的方法，就是與過去對話。只有透過這樣的對話，我們才能從當下雜亂無章的課程中解放出來。因為肯定傳統或以自助式(隨意)的方法探討教育二者是不能相容的，傳統並不是北歐式的自助餐(可以隨意任擇)而是有特定的作品與特定的作家」。¹⁸普羅克特指出，對於教育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與一己的傳統聯繫起來，以理解一己文化的存在。他認為與古代聯繫起來，不僅回顧過去，而且指向未來。只有回歸古希臘羅馬傳統的智慧與美德，我們才能獲得智慧的力量，與具有催眠作用的現代科技及發達經濟抗衡。對於現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衝突，他強調理解這種關係就是減輕這個矛盾的第一步。他說：「科學與人文學科兩者都斷言心靈與自然兩極對立，即認知主體與自然界的兩極對立。現代科技強調這種對立的關係；而人文學科則試圖肯定有一內在的統一與整合，能幫助我們適應這種兩極對立，以彌補外在世界支離破碎之不足。但是，自戀心態與自然環境的惡化，促使我們要對抗現代自然界之客體化與非神聖化，並回歸整體統一之古代理想」。¹⁹此一具體方案乃將人文學

18 Proctor, *Education's Great Amnesia*, 144.

19 同上註，頁159。

科結合到整個大學課程裡，以對現今雜亂無章的大學教育的博雅課程作一徹底修改。人文學科大概有三大目標，人文學科「能幫助我們為能對應我們最高要求的博雅教育立下目標；提供一個觀點看西方歷史；為我們展示如何以這種觀點理解和評估自己的時代」。²⁰ 結果，一個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大學課程遂得以擬定。根據古代經典著作，此一課程的內容把焦點集中於：(1) 古代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個人自主性；(2) 科學與哲學的客體化性質；(3) 個人自主性與現代社會之來源；(4) 在道德哲學中追求智慧與美德。²¹ 普羅克特的人文學科理念相當保守。就理解我們的歷史存在而言，為過去傳統重新賦予生命力是非常重要的。沉迷現在（當下）漠視過去，使我們變成像英國現代詩人艾略特 (T. S. Eliot) 所說的「虛空的人」一樣。然而，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無論過去傳統怎樣光輝，都不能為今天大學教育所面對的嚴峻問題提供任何答案。它充其量只能給予我們識見與教訓，從中我們能窺見問題的本質與意義。德國哲學家漢斯·約納斯 (Hans Jonas) 指出過去傳統與現代世界兩者之間不相對應。現代科技已大大改變了人類世界，就人類境況而言，今天與前現代時期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今天的問題只能藉著今天人類的能力方能獲得解決。任何完全依賴過去的行為，都是由於誤解現代世界的性質所致²²，當然，就大學博雅教育而論，強調傳統是必須的。

以上有關人文學科三個概念的討論表明，人文學科沒有確定的定義。雖然三者的概念互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論點，即人文學科是人類體現其潛能的人類成就。人文學科就是人之為人的研究。

20 同上註，頁 175。

21 同上註，頁 176。

22 Hans Jonas, "Technology and Responsibility: Reflection on the New Tasks of Ethics," in *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Ancient Creed to Technological Ma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6).